

建筑符号学与城市文化遗产的诠释

——以重庆城市历史遗产展示为例¹

郭璇² 彭文峥 王 谊

【摘要】 城市历史遗产作为城市特定时代历史与精神文化的载体，在对其进行展示与诠释的过程中必然面临与人的互动关系。本文从符号学的角度探索对作为城市符号实体的历史遗产的诠释过程与解读过程的差异，在认知主体对城市历史遗产符号的“再创造”的理解能力的基础上，将符号学的“共识性”与“模糊性”引入城市历史遗产展示与诠释的研究中。并以重庆渝中区城市历史遗产展示研究为例，探索该理念在城市历史遗产诠释研究中的可行性。

【关键词】 建筑符号学 共识性 模糊性 文化遗产 诠释与解读

【中图分类号】 TU-0

DOI:0.3969/j.issn.674-778.204.05.006

城市是各种文化的积聚和载体。芒福德（Lewis Mumford）说：“城市通过它集中的物质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类的交往程度，并将它的产品变成可储存和复制的形式。城市通过它的许多储存设施（书籍、档案、建筑物等）能够把它复制的文化一代一代往下传。”^[1]城市历史遗产作为传递信息的物质手段，延续着城市的精神文明。而文化遗产的展示即是向公众传递城市的历史文化信息，将遗产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诠释出来，使公众能够解读出城市演变过程中不同阶段所承载的特定历史信息。由于在我国遗产展示还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事物，遗产展示的理念和手段发展的滞后，使得遗产地本身的价值与内涵和来访者认识到的信息常常处于不对称的情况。作者将建筑符号学的理念引入遗产展示，分析以上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一种遗产诠释的理念，试图分析解决该问题的可行性。

一、符号学的概念

符号是在人与环境、事物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人类认知体系中具备的一定共通认知性的特殊形体。符号以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抽象出事物的某些本质性特征，它存在于人和事物的相互理解中，具有两项对立性。索绪尔提出的符号学理论认为符号就是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的二元关系。英国学者奥根登和里查兹在索绪尔的符号构成基础上提出了符号三角（Semiotic Triangle），在原有的能指与所指二要素的基础上增加了意指对象，也就是使用符号的人之间的关系（图1）。

¹**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地域的抗战遗产保护与利用——以陪都重庆为例（51108476/E080102）、西南山地城镇文化景观演进过程及其动力机制研究（51178479/E080201）成果。

²**作者简介**：郭璇，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研究方向：建筑历史与理论，文化遗产保护。彭文峥，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建筑历史与理论。王谊，重庆雅凯斯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研究方向：城市规划、建筑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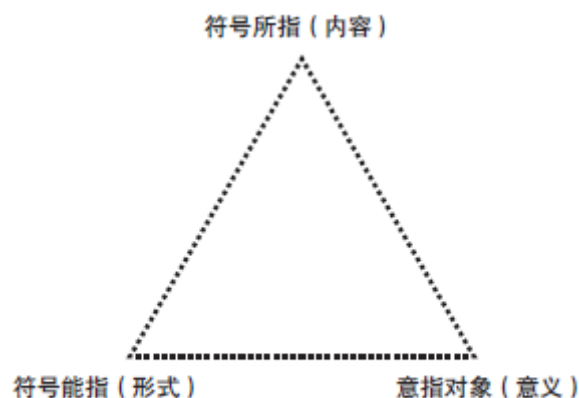


图1 符号三角

皮尔斯认为任何事物只要独立存在，并与另一事物有联系，而且可以被“解释”，它的功能就是符号活动。他将符号划分为三个层次，即符号自身、符号、符号的解释。莫里斯进一步发展了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他把符号设想为关于象征性的综合科学，认为符号学由符构学、符义学和符用学三部分组成。分别研究符号的组织结构；符号意义；符号与使用者间的关系。

这三部分几乎与皮尔斯的三层次一一对应，存在着相互兼套、包容的关系，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符号学体系^[2]（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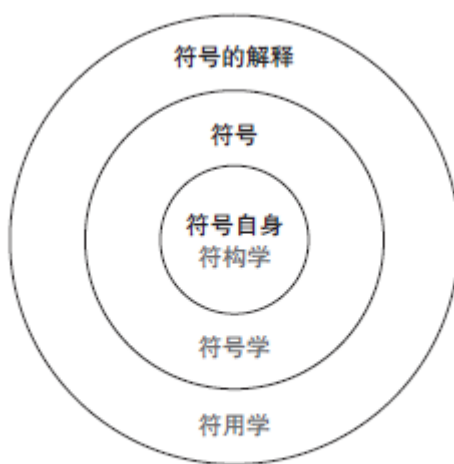


图2 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符号理论

二、建筑符号学及其诠释

（一）建筑符号的概念

黑格尔曾提出建筑是“用建筑材料造成的一种象征性符号”，是人类在对环境的认识过程中进行的营造活动。建筑符号所传达的不仅是形式，也象征着某种文化意义和情感思想。建筑符号即是将主观领域中难以把握的经验加以客观化、形式化，使其可以被人们理解和接受。

符号三角在建筑中，能指代表建筑的形式，所指代表建筑的内容，意指则是建筑形式和意义的关系，即建筑符号与人的关系。因此，作为符号体系的建筑也具有两项对立性。建筑比其他符号体系更为复杂，它具有同时性与历时性，在过去与现在、人与时间空间的交往中，建筑的象征意义得以理解。建筑也是具有“双重译码”^③的符号体系。

（二）建筑符号的诠释特点

1. 模糊性

在建筑学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同的是莫里斯对符号学的划分。符用学包含了符构学和符义学的内容，它研究的是建筑符号与认知主体的关系，其中人对建筑的诠释，是研究的本质。建筑符号承载的信息分为三个层次，即外观形式；环境空间功能；文化内涵及意义。认知主体在对建筑进行解读时做出针对三个符号层次的直觉式、实证式和解析式的诠释。

作为认知主体的人在接受这些信息时，是以社会约定为中介进行认识和理解，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认识者的年龄、经历、文化习性、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等的不同，使人们在解读建筑的含义时往往是以自己头脑中已有代码提供的信息与认识对象提供的具体信码进行比较，然后做出对建筑信息的解读，这就使得不同的认知主体对建筑符号产生不同的诠释意义。

另一方面，建筑符号形式层面的多样性和内容层面的复杂性，也导致建筑符号的多意性和认识上的不定性。加之任何简单的建筑符号，一旦和社会文化涵构结合，其所表达的意义又会更加丰富。黑格尔将建筑定义为一种象征性符号，他指出象征是用具体的视形象来暗示抽象的概念，这种暗示中的意义与形象并不完全吻合，建筑的这种象征关系的存在，更使建筑符号的诠释是模糊的、多价的。

建筑符号学有一种观点认为：建筑意义可以与建筑实体分离而独立存在。从建筑具有历时性这个角度来看，恒定的建筑实体在时间的变化中其意义也会随之变化。建筑符号的一个关键特性即是随时间而积累意义的能力。这种观点也指出了建筑符号的模糊性。模糊性指的就是一种建筑符号能够同时表达多种含义的特性。

2. 共识性

在索绪尔的符号理论中，符号所代表的含义是根据社会集体的约定俗成所规定的。符号的产生是基于人类对某一事物的共同认识。建筑作为信息的载体，是人们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将环境及文化信息的感性观念呈现出的一种外在事物。建筑符号必然依赖于人们共同认识 and 理解的旧的传统。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在对城市建筑的研究中引入的“集体记忆”的概念便是基于在同一文化环境的城市中生活的人们所形成的对城市的共同印象与认识，而他的“集体记忆”这一概念又是受到荣格^④（Carl Gustav Jung）关于“集体无意识”观点的影响，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从不在意识中，它不曾为单个人所独有，它的存在毫无例外地要经过遗传。

集体无意识主要是由“原型”^⑤所组成，这些“原型”是同一地域中人群对其周围环境形象认识所形成的特定象征意义沉积在群体中每一个人的无意识深处的心理的形式成分，通过在生活中对其所在城市内容的特定诠释过程的重复，将诠释的经验刻

³①“双重译码”一词最早由著名的建筑家、设计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在他著名的理论著作《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一书中，他认为双重译码是“名流—大众”和“新一老”这两层含义的简称。

⁴②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首创人。提出“情结”的概念。把人格分为内倾和外倾两种。主张把人格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层。主要著作有《人及其象征》（1960）、《分析心理学论文集》、《心理学形态》等。

⁵③德国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是行为的表面模式或象征性图式，在此基础上形成具体的、内容充实的形象，人在自己现实生活和活动中一直利用这些形象。在荣格看来，人的本能与其说具有生物本性，不如说具有象征本性。荣格提出了这样的假设：象征意义是心理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无意识培养出具有象征性质的、并构成人的一切观念基础的某些思想。这些思想并非是心理的内容成分，而是心理的形式成分，这就是“原型”。

进人们的心理构造中。基于这种共同的诠释经验，使人们在对同一文化环境中的建筑符号进行解读时，能够诠释出特定建筑符号所要传递的特定的信息。建筑符号的共识性特点就是人们对某一建筑符号所表达的意义达成共同的认识和理解，使这一符号给人们带来相似的心理感受，并且在文化意识的传达上代表特定的信息^[3]。

三、文化遗产诠释差异分析

（一）文化遗产诠释的概念

文化遗产是本文化的符号实体，承载了历史上人的活动过程。历史信息被符号化为外在的、具体的、浅显的存在这样的能指和内在的、抽象的文化与精神这样的所指，以文化遗产的形式被传递下来。罗西认为历史建筑要素成为该地区人们在建筑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而作为城市建筑的片段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由此，他说：“我们能做的全部只是提供片断——生活的片段、历史的片段和建筑的片断。今天，城市文化遗产的展示与诠释是将这些片断拼接在一起，使它们能够激发起一个与每个人都有关的公共的主题。

因此，文化遗产展示与诠释就是将历史信息和场所意义揭示出来。使文化遗产传递的信息与人们认识体系中的内存信码相撞击，以此产生共鸣，进而能更准确地解读文化遗产所要传递的信息。《巴拉宪章》认为：遗产展示与诠释是“能够揭示场所文化意义的一切方式”。对许多遗产地来说，其文化意义不是显而易见的，应该由诠释使其得以明白地揭示出来。这种诠释应该有助于理解和欣赏，且具有文化上的适宜性^④。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文化遗产的诠释既是将能指与其原本所指示的所指展示出来的手段，并以期与人进行交往，充当着符号三角关系中的媒介的作用^[4]。

（二）建筑符号传递信息中的语义干扰分析

建筑符号的传达功能包括“信息转化为符号”和“符号转化为信息”两个转换过程。用“信息论”的观点来解释，则可以认为建筑师是信息的传送者，设计过程表现为思想、观念逐渐转化为图像符号的过程。建筑实体建成后，公众对建筑的认识过程则是符号还原为信息的过程。

建筑师与认识者之间在建筑符号的信息传递上存在着一种“双向交流”，认识者通过“符号”理解建筑师的“意图”。在“信息转化为符号”和“符号转化为信息”的两个过程中均有可能出现语义干扰，前者出现干扰的原因有：a. 建筑师未能将其思想、观念完全转化为公众能够解读的建筑符号；b. 建筑符号无法或未能完全表达设计者的意图。而后者出现干扰的原因有：a. 认识者本身生理上的缺陷和认识上的偏颇以及感觉上的差异；b. 习惯、经验和参照系（知识背景）的不同引起认识上的差异。另外，以上两个转换过程还受到认识主体以外的客观条件对建筑符号的限定和制约，诸如建筑位置和所处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5]。

而建筑符号的模糊性特征，即建筑符号内容层面的复杂性和内涵层次的多意性以及形式和意义的恣意关系（分离性），从客观上给认识主体带来符号认识上的不定性；而认识主体本身的遗传习性，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又从主观上给认识主体带来认识上的不定性。

（三）文化遗产诠释与解读差异分析

文化遗产作为建筑符号体系，在其信息的传递过程中也具有建筑符号的“信息与符号”转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语义干扰。另外，由于文化遗产具有历时性特征，能指与所指的指代关系还会依据不同时期的文化背景而有所变化。建筑符号模糊性特点指出的在具体形象与抽象意义的符号化过程中所具有的这种不确定性，是由于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文化亚代码层中的不同的译码。这种译码是人们在已知的本文化符号诠释系统的基础上，加上不同的年龄、经历、文化习性、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等所形

^④详见 Australia ICOMOS, The Burra Charter, 1999, A25.

成的。这种存在于人们心中的译码相当于荣格所说的“原型”：“许许多多的原型，正像生活中有许多典型的情景，无数多的重复已经将这些经验铭刻在人们的心理构造中，不是以充满着内容的形象的形式，而首先是作为‘无内容的形式’表现着一种感知的可能性。当相应于某一特定原型的境况出现时，该原型被激活起来成为强制性的显现，在无意识中按照“原型”沉积时的诠释过程进行的解读过程便因译码的形成过程不同而不同。

当人们亲临文化遗产时，必然对其产生一种联想，这种联想就是一个通过文化亚代码体系解释文化遗产符号的过程。而文化遗产所诠释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意义与人们心中的文化亚代码存在着差异时，人们就很有可能产生误读，甚至人们会去寻找匹配自己文化亚代码的符号以自己的译码进行解读，而没有读取到遗产真正想要传递给人们的信息^[6]。例如，位于重庆下半城的白象街自南宋以来就是重庆下半城最繁华的街市，历史上也曾是重庆城最重要的码头。建于1850年的汪全泰号是重庆开埠时期的典型商号及旅馆，原为美商大来公司旧址，与白象街166号、大清邮局、海关办公楼、白象街151号一同诠释晚晴开埠时期白象街的金融历史。

因此，汪全泰号作为晚晴开埠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建筑，其建筑符号的诠释是基于白象街的历史背景，通过符号特征展示的是白象街开埠的历史场所信息。然而，来访者在对其进行解读时，携带着基于自身文化的诠释系统。在来访者的心中，青砖、拱券、花格窗、尖拱屋顶的建筑符号指示的是中西合璧式。因此，来访者寻找到这些较为熟悉的建筑符号，以自己的译码进行解读，而没有基于白象街的历史场所意义，汪全泰号真正所要诠释的白象街开埠时期及金融街的历史却没有被来访者解读出来（图3）。



图3 白象街142号：汪全泰号

文化遗产在进行展示与诠释时所使用的一些形式上的手段，特别是对于有破损的文化遗产进行的修复、重建以及历史形态的场景复原等，在所构成的形式比较突出或复杂时，由于建筑符号本身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制”人们按照某种方式进行对遗产的理解，或者会使人过分依据形式进行解读。

诚然，对历史信息的解读不可避免要依据形式的可读性，而文化遗产的历史符号更多的是想传递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信息。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形式对人视觉的冲击导致人们轻易对形式下定义而使暗含的文化意义没有被解读出来^[7]。例如,重庆磁器口临街建筑外立面的修复以及商业街的传统食物、建筑小品、招牌等形式打造一种历史生活形态,但这种意欲通过形式来对磁器口明清时期文化的诠释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使人们更关心去寻找形式的文化吸引物或活动所代表的符号或印象,而不是去了解磁器口传统建筑本身遗留下来的“原真性”所传递的意义。相反,“原真性”变成了某种形式符号,来访者不再是对真实的寻找,而是对符号的寻找。强烈的形式可读性掩盖了磁器口历史街区蕴含的丰富的明清时期的历史文化信息(图4)。



图4 重庆磁器口古镇

四、“共识性”与“模糊性”运用在遗产诠释中的可行性探索

(一) 提出基于人的“再创造”理解能力的诠释理念

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建筑是在历史背景下,人们的观念注入城市,与城市整体结构相互作用形成的。建筑符号属于这种城市历史文化的有机整体,所承载的信息反映的是一种集体记忆。人们在解读建筑遗产时,必然依据这种符号的“共识性”。因此,遗产展示首先将遗产地的历史信息诠释出来,使整个遗产环境是明确定义的,显著的场所符号引导来访者很快跟随遗产信息的暗示。而在具体的形式上,采用“低调”的、“模糊”的处理,调动人们的联想与记忆,使人参与到建筑符号意味的再创造中。不同来访者在这种低调的建筑符号的表达意义中,不会轻易被灌入定义所局限的结果。

利用建筑符号“模糊性”诠释的既是一种适应人的知觉模式与符号过程的遗产环境与人的互动体验^[8]。

(二) 重庆渝中区城市历史遗产展示应用探索

1. 渝中区历史遗产类型及分布

1891年重庆开埠前的2300多年内,城市规模基本上未逾越两江限制,重庆的发展都在渝中半岛内,遗留了各时期历史遗迹。渝中区的文化遗产类型丰富,分布有防御、军事遗产,明清城市格局及重要古建筑,近代开埠建筑,抗战遗产,历史地段等。不同遗产类型的历史遗存以点状分布在城市中(图5、图6)。



图5 宋-明清时期的历史遗存



图6 开埠-抗战时期的历史遗存

2. 历史信息诠释策略：历史遗迹的整合渝中区的历史遗迹弥散在城市中，作为承载历史文化信息的符号实体，孤立的存在使得其符号价值不易被解读。因此，在对历史遗迹的诠释中引入建筑符号的“共识性”进行展示规划，使拥有同类符号信码的历史遗迹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使之成为一个系统以更清晰地揭示符号所传递的场所历史文化信息^[9]。

在对历史遗迹进行整合时，采用主题展示法，将同一主题的历史遗迹串联起来，构建历史文化步道，使不同主题的历史文化信息通过所构建的遗产符号的整体环境诠释出来。依据历史遗存的年代进行主题划分，将渝中区的历史遗迹分为明清古城墙历史步道，晚晴开埠历史步道及抗战文化步道。

城墙遗址记录了重庆的发展史，它作为一个讲述历史的连续符号，构建其成为一个整体序列使其历史价值更明确地展示出来。现存的渝中区的城墙城门为通远门、东水门、人和门及其城墙和部分金汤门、临江门城墙以及太平门城门，都为明清时期遗留。城墙遗址的展示，即是对重庆建城史及城市历史格局的诠释。

其历史信息的解读是基于来访者对城门城墙特定的建筑符号所传递的重庆城市发展历史信息共同认识上，而单个的城门及片段城墙不足以展示重庆明清时期的城市格局，因此将现存的临近的城门城墙连接起来，在需要的部分适当复原城墙城门以构建城墙展示步道。通过将承载同一历史信息城门城墙历史遗产符号连接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增强符号的共识性，使其诠释出的特定场所历史信息得以被解读，且遗产符号的价值也因此得以突出（图7）。



图7 明清古城墙展示步道体系

晚清开埠历史遗存主要集中在渝中区下半城，将从朝天门到十八梯沿长江这一带的开埠历史遗存串联起来，形成开埠历史步道主线，连接了湖广会馆、白象街历史街区、位于十八梯的法国大使馆旧址等。从主线上衍生的环状支线将其余开埠时期遗存连接起来，构建的开埠展示步道使历史遗存的价值基于整体而得以互相作用，使遗产符号所传递的历史信息被诠释出来，唤起来访者在文化意识的传达上对特定符号的共同认识的解读（图8）。



图8 开埠时期遗存展示历史步道体系

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遗留下了大量的抗战遗址，分布在渝中半岛各处。依据其分布点构建的抗战文化步道主线连接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特园、桂园、周公馆、中共代表团旧址、宋庆龄故居、新华日报旧址、人民解放纪念碑等抗战遗址。并形成依托主线的多分枝多小环的步道支线，连接其余抗战遗址。

通过抗战历史步道展示体系构建起历史文化的有机整体，环境因此明显且明确定义，使集体记忆通过显著的场所符号被诠释出来，引导来访者跟随其历史信息进行解读（图9）。采用主题步道对历史遗迹的诠释，既是建筑符号共识性特征的运用，使来访者对历史遗迹能解读出其诠释的真实的场所历史文化信息^[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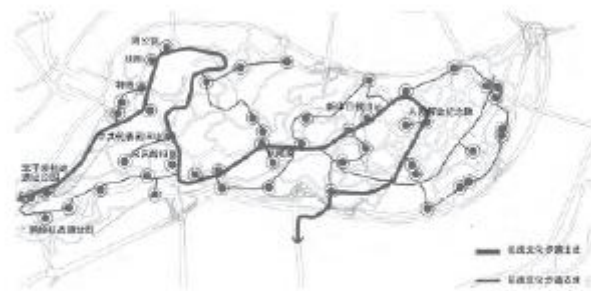


图9 抗战展示历史步道体系

3. 建筑细部诠释策略：兼容的形式

来访者在遗产符号的解读过程中，既有对客体符号形体的感知和内容的理解，又有对客体的重新认识和把握。而对遗产文化符号的解读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观者是否获得了“真实”的体验，这种体验是基于文化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同时也是个人对遗产的重新认识上。

以重庆渝中区白象街历史街区的展示方案为例探索基于人的再创造能力上的诠释策略，运用建筑符号的“模糊性”对建筑遗产细部进行诠释，利用符号学的相互参照，通过同种符号含义的重复同时具体符号形式的变化，在历史街区的建筑融为一体的基础上使建筑符号具有无限的译码可能性。

白象街 142 号、151 号和 166 号为近代历史建筑，沿解放东路有一栋早期现代主义代表芝加哥风格开窗建筑。而白象街历史街区的其他建筑多已破损，使历史建筑价值不能被很好地展示出来。在研究方案中，采用符号学的相互参照对街区建筑进行更新，提取历史建筑的符号信码，即代表开埠时期、折中主义和早期现代主义的象征符号，在更新建筑的形式中植入该符号，将历史信息进行延伸，使白象街的历史意义得以凸显。

同时，仅提取符号信息的元素而不做过多的形式上的处理，含蓄的形式提供了多元多价的解读，创造出属于观者自己的独特体验。白象街历史街区通过历史建筑细部符号模式的重复，增强其所诠释的历史文化信息的可达性，同时采取兼容的态度，让建筑产生多层次的意义，启发人们的联想，进而使人们能够深刻体验历史街区的特色与文化^[11]（图 10）。



图10 白象街历史街区展示方案

图片来源：图1-2、5-10为作者绘制。图3-4为作者自摄。

五、结语

建筑符号学引入文化遗产的展示与诠释，从遗产作为文化符号实体的角度分析了对建筑携带信息的诠释及其与人的解读产生差异的原因。结合重庆渝中区城市历史遗产展示的案例，运用建筑符号的“共识性”特征在遗产诠释中通过构建整体历史环境，强化特定遗产符号所承载的特定历史文化信息，引起人们基于传统的共同认识和理解。

同时，运用建筑符号的“模糊性”特征在遗产展示中采用含蓄、低调的形式，创造人们在解读中的个人体验，以增强历史文化信息的可达性。从建筑符号学的角度探索了通过遗产整体与局部的不同展示理念解决文化遗产诠释与解读的差异的方法。

参考文献：

- [1][美]L. 芒福德著. 倪文彦, 宋峻岭译. 城市发展史[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 [2]戴志中, 舒波, 羊恂, 赵冶. 建筑创作构思解析——符号、象征、隐喻[M].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6.
- [3]董黎. 论建筑符号学在建筑设计中的意义及运用[D].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 2007.
- [4]郭璇. 文化遗产展示的理念与方法初探[J]. 建筑学报, 2009, 9: 69-73.
- [5]章迎尔. 符号理论与建筑的符号性[A]. 高介华. 建筑与文化[C]. 天津: 科技技术出版社, 1999. 12.
- [6]刘先觉. 现代建筑理论[M]. 第2版.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 [7]刘树明. 文化遗产地旅游资源符号的解析与判读研究[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1.
- [8][美]查尔斯·詹克斯. 当代建筑的理论和宣言[M]. 周玉鹏等译. 第1版.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9]刘爱河. 浅议文化遗产的符号价值[J].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 2008, 02:29-32.

[10]王建波, 阮仪三. 作为遗产类型的文化线路——《文化线路宪章》解读[J]. 城市规划学刊, 2009, 04:86-92.

[11]潘艳玲. 基于符号认知的历史街区旅游体验研究[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 2012.